

汉语方言中感官动词“听”的词义转移及相关问题

王帅臣*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

提要: 汉语方言中存在词义转移的现象。本文以感官动词“听”为例, 描写其词义转移与分布的现状, 总结“听”的用法与区分类型, 并尝试从类型学、文化认知、词汇史等视角探讨词义转移形成的机制与动因。

关键词: “听”, 感官动词, 词义转移, 类型学, 文化认知, 词汇史

1. 引言

“一般所谓感官动词 (sensory verbs) 指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所涉及的与人的五大感官功能: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相关的动词, 这类动词表述通过眼、耳、鼻、舌和手感知世界的意义, 如听、看、闻、尝、摸等 (高再兰 2012)。”感官动词的词义研究, 既有助于揭示此类语义场语义发展的规律, 也有助于了解人类认知自身、外在世界的途径、特征。姜兴鲁 (2010)、曾石飞 (2011) 等以感觉器官为依据, 把感官动词分为视觉感官动词、听觉感官动词、嗅觉感官动词、味觉感官动词、触觉感官动词; 赵彦春、黄建华 (2001) 在分析英语感官动词的基础上, 提出了感官动词的三分类型, 即如 look、watch 等以“意图”为特征的感官动作动词, 如 see、hear 等以“结果”为特征的感官感知动词, 如 look、feel 等以“状态”为特征的感官系动词。汉语中的感官动词也可以依此分为三类, 目前学界对前两种感官动词的分类讨论较多。一般来说, 感官动词内部地位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均质的。晋小涵 (2013: 41) 认为感官动词处于从动作向认知过渡的连续统上, 并指出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到触觉的五种感觉, 其主动性、客观性、距离性、重要性是依次减弱的。这种生理地位的不平衡性也就决定了其在语言中的不平衡性。

汉语感官动词中存在一种词义转移现象, 即感官动词的词义由原来的表示某一器官的动作转移到表示其他器官动作的现象。如本指“手部动作”义的“提”, 后来发展出表示“口部动作”的言说义, 如“这样的话, 以后就不要提了”一句中的“提”就有言说动词义, 发生了词义的转移。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此类词义转移现象。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 人们 (张永言 1960、1962; 傅东华 1962; 洪成玉 1989; 徐俊

* 王帅臣,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2016 级博士生, 邮箱: wangshuaichen@sina.com. 本文曾在第四届中国语言资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2017 年 9 月, 陕西师范大学)。在此感谢导师张世方教授对论文的修正, 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霞 2003; 常媛媛 2009; 徐莉娟 2010 等) 围绕“闻”从听觉义转移到嗅觉义的词义转移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针对手部动作的感官动词词义转移到口部动作义的现象, 曾艳青、吴怀智(2000)、魏红(2006)从方言材料出发加以证实分析, 董正存则(2009、2012)以“提”、“扯”等为例从历时的角度进行梳理, 并从语言类型、隐喻等角度进行探讨; 高再兰(2012)从汉语方言事实出发, 描写了华容湘语的感官动词“看/听”用作无条件小句标记用法, 同时指出“看”开始了向因果小句标记的演变, 并结合近代汉语、英语中的同类现象, 从类型学的角度加以解释。一般来说, 词义转移的结果并不太一样, 有的前后义兼有, 如上文提到的“提、扯”, 有的前义消失或使用受限、后义留存, 如“闻”。

在汉语方言中, 感官动词“听”也存在词义转移现象, 即由“听觉义”转移到了“嗅觉义”。这种词义转移现象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一定的分布, 本文将以这种现象为例, 通过跨方言的比较, 尝试从类型学、文化认知、词汇史等角度揭示词义转移的机制和动因。

2. “听”的词义转移与分布

2.1 “听”的本义

“听”, 甲骨文、金文时期为会意字, 从口从耳, 表示口有所言, 以耳得之为声, 其得声之动作为听。小篆《说文》所从之惠为叠加声符。《说文》: “聽, 聆也。”段玉裁注“听者, 耳有所得也。”繁体为“聽”或“聽”。“听”从元代以来就是“聽”的简体, 读“yīn”之“听”(《说文》: “听, 笑貌”)乃异代同形字。读 yīn 之“听”在古籍中极罕用, 所以读“tīng”之“听”不会与之混淆。

从以上文献材料可知, “听”本来指耳朵的动作。此义用例在古代文献中常见。例如:

(1) 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2) 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礼记·大学》)

(3) 夫目以处义, 足以践德, 口以庇信, 耳以听名者也, 故不可不慎也。(《国语·周语下》)

清代段玉裁在解释“听、闻”时说: “往曰听, 来曰闻。”这一解释很好的说明了二者的区别。即“往曰听”是侧重主动去感知声音, “来曰闻”则是侧重被动地感知声音。也可以说, “听”, 强调耳部动作的主动性、动作性。相比之下, “闻”强调耳部动作的被动性、结果状态。这一点在“听而不闻”一句的“听闻”对举中更加显化。二者的语义侧重的对比关系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存在。

2.2 “听”的词义转移现象在方言中的分布

在汉语方言里, 感官动词“听”, 不仅表示耳朵的动作, 也可以指鼻子的动作, 发生了词义转移。查阅《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以下简称“现代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简称“汉语词典”)、《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图 122 “闻用鼻子~”),

简称“地图集”), 以及他人专著论文(用作者年代形式标出), 结合个人初步调查或是他人提供资料(简称“调查”), 我们发现“听”的词义转移现象在许多方言区、方言点都有分布。现列举如下^①:

北京 地图集: 平谷。

河北 调查: 迁安、迁西、霸州、雄县、徐水;

汉语词典: 满城;

地图集: 昌黎、丰润、唐海、香河。

山东 汉语词典: 荣成、牟平(现代词典也出现);

地图集: 乳山。

浙江 汉语词典: 温州; 调查: 乐清。

上海 现代词典: 崇明。

湖南 地图集: 邵县、邵东、邵阳市、邵阳县、新邵、泸溪(乡)、泸溪(湘);

调查: 桂阳;

贺凯林(1999): 淑浦。

江西 调查: 南昌、宁都; 地图集: 瑞金; 现代词典: 萍乡、黎川。

安徽 地图集: 太湖。平田昌司等(1998): 休宁。

广东 地图集: 广宁、云安。

根据初步统计, 在全国汉语方言中, 共有以县或县级市为单位的 35 个点存在感官动词“听”的词义转移现象。在官话区、吴语区、赣语区、湘语区、徽语区、粤语区等方言区内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这一词义转移现象, 还有通过语言接触向少数民族语言中扩展的现象。如邓玉荣(2008)(音标未引)指出, 勾漏粤语“闻(嗅)”与“(耳)听”都说“听”, 侗语“听”把这两个意义都借入了。因未得到勾漏粤语“听”的具体分布资料, 所以没有纳入统计。不过, 我们可以推测, 实际存在此类现象的方言点会更多。纵观词义转移的情况, 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为单独用“听”, 即在任何情况下不区分听觉义和嗅觉义, 一律用“听”。这样的情况共有 24 点, 包括河北昌黎、丰润、唐海、迁西、迁安、香河、霸州、雄县、徐水、满城, 山东荣成、牟平、乳山, 江西瑞金、南昌、宁都、黎川、萍乡; 湖南新宁、邵县、邵东、桂阳; 浙江乐清、上海崇明。这些地区的人们在与外地人交流时, 往往会使用表示嗅觉义的“听”。这通常会使得外地人感到吃惊、新奇。以上地点中比较特殊的是浙江乐清、上海崇明(分析见下文)。浙江乐清话中“听”兼有听觉、嗅觉接受动作两个义项, 但是在表示嗅觉义时, “听”与其他地区不一致, 即对象仅限于远处的气味, 近处的气味不能与之搭配。

第二类为“听~闻”并用, 即二者都可以表示嗅觉义, 共 6 个点, 即北京平谷, 湖南新邵市、邵阳县, 浙江温州, 广东广宁、云安。比如北京平谷区是北京官话向河北冀鲁官话的过渡地区, 该地区的老派平时说“听”多, 间或用“闻”。临近北京城

^① 感谢中国刑警学院欧阳国亮老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郑君龙、硕士生苏鹏提供语料。

区的人多说“听”，临近河北的地区多说“听”。这一情况与其所处方言过渡区域有关，北京话用“闻”，临近河北地区用“听”。

第三类为“听~嗅”并用，即二者都可以表示嗅觉义，共5个点，即安徽太湖、休宁，湖南泸溪（乡），泸溪（湘）、溆浦。此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一样，应为不同时代、地域方言叠加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溆浦方言中“听、嗅”词义稍有不同，“听”表示无意闻到，“嗅”表示主动去闻。（贺凯林 1999：187）

“听”的词义转移现象，散见于汉语各地方言，从比例来说也许并不大，但是从数量上来说，并不很少。况这一现象分布基本不连片分布，地理空间跨度也很大，况且各方言归属不同，基本可以排除地理语言接触、共同来源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解释这一现象，无疑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

3. “听”的用法、区分及相关问题

3.1 “听”在方言中用法

排除“听”表示听觉义的用法，我们把从《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以及其他方言资料中搜集到的有关嗅觉义的用法整理如下，从而有助于我们可以了解“听”在各方言里的具体用法^①。

冀鲁官话：(4) 你听听这花儿香不？（河北满城）

(5) 你听听这饺子馅咸不咸？（河北雄县，调查）

胶辽官话：(6) 听听今儿的饭是不香？（山东荣成）

(7) 你听听花儿是不香？（7-11 为山东牟平）

(8) 你没听见地瓜味儿？

(9) 你听听花儿真香。

(10) 鼻子不好使，管麽味儿听不见。

(11) 眼是火，手是灯。摸一摸，听一听。（指母亲夜间判断婴儿是否大便）

吴语：(12) 听听何物味道？（上海崇明）

赣语：(13) 幾真香仔，你听不到咧冒吗？（江西萍乡）

(14) 该股气息 se 幾难听仔。（同上，标调略）

(15) 汝听下香不香？（江西黎川）

(16) 你听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有味道？（江西宁都，调查）

以上例句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表示嗅觉义“听”的使用全貌，我们可以概括出其用法，即单用、一般重叠使用或中间加数词“一”形成叠用、带结果补语、带数量补语。从中可以看出各地表示嗅觉义“听”的用法基本上大同小异，比较封闭单一。

3.2 “听”在方言中的区分类型

^① 文中例句除注明出处外，均来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

那么,在这些发生词义转移的方言里,“听”是如何区分“耳部动作”、“鼻子动作”的呢?区分的情况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

①语境区分

询问母语者,两种含义的“听”的使用也基本一致,二者的区分主要靠语境,即看说话者在具体语境中的所关涉对象,极少有混淆现象产生。

②变音区分

在一些方言中,与前一种仅依靠语境区分不同,“听”的两种意义可以通过改变声调、韵母或是声调韵母的方式改变读音,从而加以区别。如在上海崇明话(张惠英 2009: 45、47)中,“听”的两种词义,表示耳朵听,读 t'in33,属于阴去;表示鼻子闻,读 t'an55,属于阴平。此外,福建长汀客家话(罗美珍、邓晓华 1995: 180)中,“听”在“听话听说义”“听倒听见义”中分别读“theŋ33”、“ti33”,韵母不同。虽然都表示听觉义,但是由于侧重点不同,二者读音也不同。这也可以视为词义转移前期的一种音变区分现象。

③分工区分

“听~闻”、“听~嗅”并用的区域,二者都可以表示嗅觉义。在有些地区存在使用频率的差别,如上文北京平谷的情况。有些地区二者的区分和年龄、文化程度、使用词语和场合等有关。一般而言,年龄小,文化程度高、比较文雅、书面的词语,比较正式的场合,人们倾向于使用“闻”、“嗅”;反之,则倾向于使用“听”。之所以出现并用的情况,与不同时期方言系统中词语的叠置、普通话或权威方言或强或弱的影响有关。此外,上文提到的乐清方言中的“听、闻”、溆浦方言中“嗅、听”,二者通过词义上的分工加以区别。

4. 词义转移现象的机制与动因探讨

4.1 词义转移的类型学视角

语言类型学从跨语言、方言的视角,探索语言的共性,为解释语言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认为感官动词的词义转移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即 Viberg 的感官动词等级序列。“Viberg (1984) 调查了跨语言的知觉动词 (perception verbs) 的规律:从视觉动词词义可以扩展到其它知觉动词,相反则不行(转引自张莉 2013)”。 “也就是按照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的顺序,也就是说左边的永远比右边的功能‘显赫’(该术语见刘丹青 2011),感官动词越容易扩展,功能也越多(高再兰 2012)”。汉语中与五官有关的动词的词义转移就是如此。如“看”在唐代的诗歌中,就出现了由视觉义转移到听觉义的实例,相当于“闻”(王镆 1997)。汉语史中“闻”也经历了由表示耳部动作到鼻子动作的转移。在汉语方言中,“听”的词义转移就符合感官动词等级序列,也如同“闻”一样,发生了同样的转移。因为表示听觉感官动词的扩展性更强,可以扩展到表示嗅觉义。

在方言中,不仅与五官有关的动词会发生词义转移,与五官有关的名词、形容词也会如此。如“涕”、“泪”在发展中也发生了词义转移。汪维辉(2000)曾对此做

过详细的分析。上古汉语管眼泪叫“涕”，不晚于汉末指眼泪的“泪”在口语中取代“涕”，到六朝后期“泪”已占据主导地位。而“涕”则由与眼部有关的名词，词义转移到与鼻子相关。与表示五官能力、状态有关的形容词也可以发生词义转移。如“从汉藏比较和汉语本身来看，表示视力差（瞎）和表示听力差（聋）有时是一个词“睽”（黄树先 2012：174）。”“睽”本用来形容眼部的性质状态，但却转指形容耳部的性质状态。“瞎”本指一种眼部的性质状态，在河北霸州方言中，“鼻子闻不出味道”则被称为“瞎鼻子”，也发生了和“睽”一致的词义转移。“聋”，本来是表示耳部器官能力的形容词，但是在一些方言中（如河北迁西）有“你鼻子这聋呐！”的说法，“聋”则是指鼻子闻不出味道，本来是描述耳朵能力、状态的形容词，却转移来描述鼻子器官能力、状态，这从侧面证实了“听”从“听觉义”到“嗅觉义”转变的方向性。汉语中的“听、闻、涕、泪”等词都向鼻子部位转移、扩散词义，基本上符合这一机制。当然，这种转移并未使前、后的词义消失，而是前后词义在使用中并存。

西方一些语言学家也发现此类词义转移现象，“表示感官活动的名称比较容易移动，在很多其他语言中表示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的常常只是一个词，或者彼此交替使用着”。（J. Vendryes 1937，转引张永言 1962），同时提到威尔士语动词 *clybod*（听到）用作“嗅”、“尝”、“摸”的意义，爱尔兰语动词 *atcluinir*（我听到）、希腊语中都有此类情形。汪维辉、秋谷裕幸（2017）引用 Dimmendaal（2001：387）的资料，指出非洲的多数语言也不分“to hear”和“to smell”。可见，由听觉义到嗅觉义转移的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且转移具有方向性。而汉语方言中“听”的词义转移完全符合感官动词的等级序列。

4.2 词义转移现象的文化认知视角

“听”的词义转移背后体现着感官动词的等级序列，但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认知方面的原因。词义的发展变化都有认知方面的原因。

4.2.1 文化心理

中国古人历来有五官相通的文化心理，随着佛教的本土化，这一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其实这种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类较为普遍的文化认识。德国美学家费歇尔认为“各个感官不是孤立的，它们是感觉的分支，多少能够互相代替”（赵艳芳 2001：43），也可以看作是五官互通认识的一种反映。基于人类的共同心理，发生词义在不同部位的转移就有了可能性。

4.2.2 词义转移背后的隐喻机制

隐喻和转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也是语义发展的重要途径。“一词多义起源于不同认知域以及同一认知域中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Lakoff 1987：13）黄碧蓉（2010）在研究人体词语语义的过程中，得出了人体词语多义语义构建的机制，即基于相似性和邻近性，经过认知突显，通过隐喻和转喻的途径，从而构建起新的语义系统。这一机制有助于我们认识汉语中的词义转移现象。

“听”的词义转移与隐喻机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隐喻是基于相似性的不同认

知域的投射，认知突显则是认知主体对相似性、邻近性的强化、前景化。认知突显的实现离不开激活的作用。陆俭明（2009）认为无论隐喻、转喻宜假设为“一个认知域激活另一个认知域”。而激活的前提之一是意念图式。意念图式是人类与世界互动中形成的经验和理解的组织结构，具有反复性、基础性的特点。意念图式的概念最初反映隐喻理论中。意象图式对多义体系范畴化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这已经得到验证（朱彦 2016）。基于此，我们可以把词义转移的隐喻机制概述如下：人类的经验与理解以意念图式的形式呈现，意象图式在激活机制作用下，特征得以突显，从而实现投射，形成新的语义。

促使“听、闻”都发生了词义转移与隐喻机制密切相关。在这一机制之下，“听、闻”的词义转移现象可以看成如下一系列的过程：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之中，经过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加工、认知突显，形成了各种表示动作的意念图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动作构型、动作概念，尽管意念图式种类繁多，但是其本质在于给这些动作以框架。在激活这一机制的作用之下，分属不同认知域或同一认知域的各种图式及其内部发生各种或强或弱，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只不过有些联系得到加强、传播，有些没有得到推广、扩散，从而浮沉迥异。具体来说，“听、闻”本来是对耳朵、鼻子对外在声音、气味所做的一种反应，且以动作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们得出两者[+对外在事物反应]的特征，尽管做出反应的器官不同。在激活的作用下，两个分属不同的认知域的[+对外反应]这一特征，得以发生联系，并加以贯通，从而产生词义转移，构建新的多义系统。其实这与“听就是吃”、“听就是接受”的隐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当然，多义系统会相互竞争，产生不同结果。有些词义并存下来，如“听”，而有些词义只在不同时代或独特文体、场合中使用，如“闻”，实现了替换。

此外，在《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22幅“闻用鼻子~”）中，我们还发现在云南的龙州存在用表示口部动作的词“喇”在词义上转移到表示嗅觉义的现象，在浙江淳安等十几地存在表示两物相触或相撞的动词“碰”在词义上转移到表示嗅觉义的现象。本来表示口部动作、物体动作却转移到表示鼻子的动作，这其实都与隐喻机制有关，现一并作简要分析。

“喇”在认知上具有[+用唇舌吮吸]的特征，因而弱化了唇舌的发音功能。而“喇”与“听、闻”[+对外反应]的特征得以激活，而[外在对象不同]这一特征却被弱化，形成不同认知域的跨越，形成多义系统。“碰”的多义系统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碰”的认知源自对物而非人的行为的突显。“碰”的认知图式本指两物相触或相撞。第一步发生由物到人的激活，产生[+人/人、人/物的撞击]特征。这一过程有人称之为由物及人。但是激活并未就此停止，而是继续强化转移，“碰”的[+两者之间的相遇]特征得以强化突显，从而成为可以表示鼻子动作义的词语，鼻子动作的特征[+两者相遇（忽略主动被动）]得以突显、前景化，产生了新的词义。这样经过两次激活，特征侧重不断突显，构建了“碰”的语义系统。

除了以上基于隐喻机制的探讨外，我们在语料库检索到一些语料，可以为由听觉义转移到嗅觉义的隐喻投射机制提供佐证。

汉语方言中感官动词“听”的词义转移及相关问题

(17) 我就一听呢，就很亲切。要是说比如说，像东北人说的相声吧，我一听就是东北味儿，就不像那个北京人说话。(北京口语语料库)

(18) 不能说是个那什么，只能说个啊，喜好。但是我一句都不会唱。爱听听他们那个味儿。(北京口语语料库)

(19) 严清光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也听不出这句话有什么火气味，只能左顾言它地说：“你还没吃晚餐吧，我带个便当来给你”。(BCC 语料库，文学作品《最后的东方情人》)

(20) 听闻到勒一种气味，不敢面对的气味。久违跪求!!! (BCC 语料库；微博)

(21) 阔别三年的歌曲，听起来还是很有味道。(BCC 语料库；微博)

以上语料多为口语语料，在口语中，人们交际的时候，“听”往往和“味道、味儿”在一起搭配使用，可以看作“听”对语境还有所依赖，还不具备独立表达嗅觉义的功能，是一种过渡状态。当然，诸如“觉得”、“感受”、“觉得”等心理动词也可以和“味儿、味道”等搭配，此处有些语句中的“味儿、味道”也并不一定实在，“听”也有一些修辞用法的特点，但是这背后的机制是相通的。这种搭配也可以理解为隐喻机制在起作用。“听”再往前发展一步，可能就会产生嗅觉义了。

4.2.3 词义转移现象与词汇史的分期

“听、闻”同义，在书面语中经常并举，徐俊霞(2003)、常媛媛(2009)、徐莉娟(2010)等对“闻”、“听”及其相关词语的词义演变、更替进行论述。基于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闻”的词义演变、更替轨迹。即早在战国时，就有闻兼听觉义和嗅觉义的情况。“闻”侧重结果，“听”侧重动作，隋唐以前二者总体上用法严格区分。从唐朝开始，表示听觉义的“闻”可以兼表结果和动作，直到明代，“闻”基本被“听”取代。从宋代开始或是更早一些，表示听觉义的“闻”开始兼表结果和动作，并与表动作的“嗅”长期并存，后来表示结果的义项退出，取代了“嗅”，常媛媛(2009)则认为在东汉时期，这一过程已完成。从而形成“听”主要表示听觉义，“闻”主要表示嗅觉义状况，直到现在。这一情况是与汉语史的分期有密切关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新词新义的大量涌现，一批常用词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更替，这种变化大都早在东汉(有的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应该说，这是一种意义深刻的变化(汪维辉 2000: 456)。”这种变化与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体现了上古向中古过渡的活跃特征。而“闻”的变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在这一过渡阶段，双音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在“闻”兼表结果和动作的过渡阶段，其后常与“着”、“得”等连用，为词义的转移提供了语法层面的基础。新的用法往往促成新词义的产生。“一个词经常同某些词语结合，则有可能把这些词的内容压缩到该词的意义之中”，“词的潜在搭配有理由看作词位意义的一部分(Lyons 1977: 613)”。新的词义能够产生的背后运行的依然是隐喻机制。其搭配信息能够帮助确定在具体语境中的语义，从而产生新的意义，隐喻机制得以实现。

“听”的词义转移可能也在词汇分期时或稍后发生，不过可能由于其口语性的特点，鲜有正式文献记载。《牟平县志》(1936)中说：“鼻嗅曰闻，俗曰听。”也是“听”

表示嗅觉义主要通行于民间俗语中的一个佐证。此外,加之“听”的用法比较封闭,在语境中不产生歧异,不易形成词汇空位,或是通过上文所说的变音、分工加以区别,在有些方言中便无继续分化的必要,这可能是“听”的“嗅觉义”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如此就形成了“闻”在书面语中主要表示“嗅觉义”,“听”在口语中“听觉义”兼表“嗅觉义”的共时分布。

4.3 词义转移的动因试析

词义转移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客观世界、主体世界、语言世界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可参见侯博 2006)具体而言,学人又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释。如方平权(2005)认为“词义变易的动因,主要是指由应用(主要是俗语源)所引起的重新分析”。汪维辉、秋谷裕幸(2017)一文曾提到表示“嗅到”义没有专用的词是引起上述种种变化——“嗅”用作“嗅到”义和“闻”既表示“听到”又表示“嗅到”的根源,这是词汇空位引起词义转移的实例。

词义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张博(1999)认为“在词义系统内部,一个词意义的运动变化,往往会牵连带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或几个词的意义也发生相应的运动变化。换言之,相关词的意义引申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互不相干、各行其路的独立运作,而是相引相从、路线一致的有序共变。”例如,同为手部动作动词的“提、拉、扯、拌”等发展出言说义,且此类现象在英语中也较为普遍(董正存 2009)。此外,张博(1999)还提到了“组合同化”、“聚合同化”。概言之,词语由于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的关系,从而在词义演变上面会呈现较为一致的现象。

以上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以寻找现实动因。我们认为,促使感官动词“听”发生词义转移的现实动因是组合同化、聚合同化,即主要和“听”的实际使用情况相关。“听”、“闻”侧重虽有不同,但在“听觉义”上是近义词。暂不论学界对“闻”本义的争论,就日常生活而言,人们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可以称之为俗语源,即“闻”的本义是“听觉义”,后来产生“嗅觉义”。在实际语料中,我们发现“听闻”常常在一起使用,甚至还有成语“骇人听闻、耸人听闻”,也就是说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本来词义相近,又经常搭配组合,组合聚合交织在一起。那么当“闻”的“嗅觉义”推广开来之后,“听”也就会在组合同化、聚合同化的作用下,类推出“嗅觉义”。而不同的地区“听”的“嗅觉义”的产生、扩散又与不同时代、地域、甚至通语中相关词语的竞争、更替、叠加等因素密切相关,不能一概而论。

5. 余论

本文以感官动词“听”为例讨论词义转移现象,尝试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和动因。简言之,“听”的嗅觉义的产生,我们认为原因有三:一、从类型学上看,听觉感官词语比嗅觉感官动词扩张性强。侯博(2006)也指出“在人体感官语义场中,嗅觉是一个极弱的子义场。”这是词义转移可能性原因;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机制以及词汇分期时人们认知上的原因。这是词义转移发生的倾向性原因;三、语用原因。汉语中“听闻”词义相近,加之经常并用,在组合作用和聚合作用的联合作用之下,

汉语方言中感官动词“听”的词义转移及相关问题

词义浸染，“闻”的嗅觉义影响“听”，使“听”产生了“嗅觉义”，这是词义转移的现实动因。加之“听”的口语色彩，能够长期存在。但是词义转移现象复杂，如仅在《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22幅“闻用鼻子~”）中，就有一些来历不清、本字不明的同音词、或是有音无字的词语表示嗅觉义的感官动词。这些词语本字是什么，词义转移的原因和机制是否一致等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察。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常媛媛. 2009. “闻”与“嗅(臭、龃)”的历时替换研究[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8:53-54.
- 邓玉荣. 2008. 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各民族语言间的相互影响[J]. 方言, 3:204-215.
- 董正存. 2009. 词义演变中手部动作到口部动作的转移[J]. 中国语文, 2:180-183.
- 董正存. 2012. 动词“提”产生言说义的过程及动因[J]. 汉语学报, 2:41-46.
- 傅东华. 1962. 关于“闻”的词义[J]. 中国语文, 10:480-481.
- 高再兰. 2012. “看/听”从感官动词到小句标记[J]. 语言科学, 5:489-498.
- 龚萍. 2010. 汉语“听”的认知语义分析[J]. 语文学刊, 4:99-117.
- 侯博. 2006. “闻”的词义演变深层原因探赜[J]. 语文学刊, 7:143-146.
- 贺凯林. 1999. 溆浦方言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洪成玉. 1989. 释“闻”[J].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5:107-112.
- 黄树先. 2012. 比较词义探索[M]. 成都:巴蜀书社.
- 黄碧蓉. 2013. 人体词语语义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姜兴鲁. 2010. 竺法护译经感觉动词语义场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晋小涵. 2013. 现代汉语实据性的认知阐释[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荣主编. 2002.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刘志基主编. 2014. 中国汉字文物大系[M]. 郑州:大象出版社.
- 李学勤主编. 2012. 字源[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罗美珍、邓晓华. 1995. 客家方言[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陆俭明. 2009. 隐喻、转喻散议[J]. 外国语, 1:44-50.
- 平田昌司等. 1998. 徽州方言研究[M]. 东京:好文出版社.
- 汪维辉. 2000.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汪维辉、秋谷裕幸. 2014. 汉语“闻/嗅”义词的现状与历史[J]. 语言暨语言学, 5:699-732.
- 王镛. 1997. 试论通感生义——从闻字说起[J]. 语言教学与研究, 4:23-28.
- 魏红. 2006. 从肢体行为到言说行为——试析明清山东方言里一类词义的演变[J]. 岱宗学刊, 3:1-3.
-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M]. 北京:中华书局.
- 徐俊霞. 2003. “闻”的词义演变[J].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98-99.
- 徐莉娟. 2010. “闻”的词义演变[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6:62-64.
- 岳朋雪. 2017. 论“听”的嗅觉义[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4:21-24.
- 张博. 1999. 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J]. 古汉语研究, 4:129-136.

王帅臣

- 张永言. 1960. 词义演变二例[J]. 中国语文, 1:33-34.
- 张永言. 1962. 再谈“闻”的词义问题[J]. 中国语文, 5:229.
- 张莉. 2013. 词义类型学研究[J]. 语言研究, 3:33-39.
- 张莉. 2016. 语义类型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出版集团.
- 张惠英. 2009. 崇明方言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朱彦. 2016. 意象图式与多义体系的范畴化——现代汉语动词“赶”的多义研究[J]. 当代语言学, 1:38-50.
- 赵彦春、黄建华. 2001. 英语感官动词模块性的语义分析——认知词典论对词库的描写[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4:11-14.
- 曾艳青、吴怀智. 2000. “才”(手)部动作动词的意义伸展与转用[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103-106.
- 曾石飞. 2011. 中古汉语感官感知类动词语义场研究[D]. 宁波: 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赵艳芳.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yons, John. 1997.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Semantic Shift of the Sensory Verb “ting (听)” and Relevant Problems in Chinese Dialects

Wang Shuaichen *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semantic shift exists in Chinese dialects. This paper takes the sensory verb “ting (听)” as an example to describe its semantic shift and distribution, and to summarize its usage and distinguishing types. Furthermore, it trie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and mechanisms behind the semantic shif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ypology, cultural cognition and lexical history.

Keywords: “ting (听)”, sensory verbs, semantic shift, typology, cultural cognition, lexical history

* Dr. Wang Shuaichen: Academy of Linguistic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ina.